

据统计，当年每年到烟台博物院参观的达8万至9万5千人次，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

博物院所藏的两条巨大的鲸鱼颌迄今还放在烟台市博物馆的角落里。

郭显德创办山东最早的博物馆

□ 东平 马修建

在烟台毓璜顶北坡的烟台警备区里，穿过一片冬青丛，就是“毓璜顶西桥公墓”的旧址，一些残缺的墓碑、底座散落在树丛之间。1950年抗美援朝期间，这里遭到彻底毁坏，碑石被砸、棺木被焚。然而有一块墓碑保存相对完好，这个碑是美国来华传教士郭显德的墓碑，一个在烟台开埠历史中不能不提的美国人。他在烟台开创了多个名列“第一”的文化事业，其中包括创建了山东省第一家自然博物馆，这就是烟台博物院。

“外国人不杀郭显德”

鸦片战争后，西风东渐，博物馆也被西方传教士引入中国，并迅速遍布华夏大地。其中教会博物馆不同于一般展览功能的博物馆，它带有传播福音的使命。烟台博物院作为近代山东最早建立的教会博物馆，将展览与布道相结合，在传教中起到了作用，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1861年，美国北长老会派传教士赴登州(今山东蓬莱)传教，开辟了山东教区。1864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郭显德(Hunter Corbett, 1835—1920)受美国北长老会委派，到达登州传教，翌年又转赴新开辟为通商口岸的烟台活动。

1924年出版的《烟台要览》载：“烟台之有耶稣教，始于清同治元年。有长老会教士麦嘉缔至烟台传教。同治三年又有郭显德教士至烟台传教。”1937年出版的《烟台概览》又载：“其首先到烟台传基督教者韦廉臣博士夫妇……第二人是麦嘉缔牧师，美国长老会，1862年来烟台。第三人是郭显德牧师，美国长老会，1864年来烟台。现益文、信义两校皆其首创，收教友二千人。”郭显德是最早来烟台的外国传教士之一。烟台自1861年正式辟为通商口岸以来，各国纷纷设立驻烟台领事，外籍人口不断增加，1891年烟台的外国侨民已达370多人。

工作一段时间后，郭显德发现仅靠单纯的布道，传教效果收效甚微，他见当地民众喜好收集和欣赏古玩，遂萌生借开办博物院传教的想法。1875年，郭显德返美时即着手为此募款。1876年返华后，郭氏得在烟台的一广东富商资助，以5700元买下了同乐街(今市府街)37间房，创立“博物院福音堂”，陈列珍禽奇兽和矿石标本，以吸引民众参观，借机传教。据统计，每年到博物院参观的达8万至9万5千人次，当时烟台的青少年鲜有不到博物院玩耍的。博物院所藏的两条巨大的鲸鱼颌迄今还放在烟台市博物馆的角落里。

郭显德前后在烟台地区活动长达56年，他积极融入中国社会，熟读四书五经，遇有与民众冲突，多能隐忍，且动辄以儒家道理与人理论，时人送其绰号“郭麒麟”。他于1866年12月首先创办烟台最早的新式学校文先小学(男校)和会英小学(女校)，后二校合并扩充为文会书院。1890年，他在毓璜顶开设医疗诊疗所(也称美国医院)，后发展扩建为毓璜顶医院。1900年郭显德夫人开设幼稚园，在烟台亦乃首创。仅在烟台就有10余处学校由郭显德所创办，他的作为受到中、美两国政府赞扬。1902年清政府赠给他单眼顶戴花翎，之后民国政府亦颁给他“双龙嘉禾”奖章一面。在美国，郭显德以他突出的业绩赢得了学术界和基督教总会的认可，并于1907年在白宫受到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

《烟台要览》载：“郭公在烟历五十余年，开



创学校数处，博物院一处，并著有卫生编孝敬父母等名著，为长老会中之伟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拳民到处杀戮外国教士与中国教徒，但却在山东流行“外国人不杀郭显德”的口号，可见郭氏在民众中的威信。

一日间即可游遍全球

烟台博物院采用教会组织，院长亦称主教，经费由美国长老会提供。1902年，基督教烟台奇山会成立，旋由该会主办，通称“烟台博物院”。

烟台博物院展品主要是自然科学类，涉及动植物、矿产标本、近代科学仪器等，另有展示西方工业文明的器械，皆做成模型、图表，陈列展览。院内展品除郭显德私人收藏外，亦有中国工人制作的模型及从各地搜集或别人捐献的标本，其中当时同在山东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柏尔根(Pall D.Bergen)捐献自然展品颇多。博物院还不时更新展品，凡有新奇物件，或图画，无不陈列。

当时美国北长老会的教士连警斋为纪念郭显德，于1937年编的《郭显德牧师传全集》曾称赞博物院的展品：“乃如无声之电影，将天地间凡被上帝所造之物，排列眼前，使参观者一日间即可游遍全球，动植物各从其类，有条不紊。”

郭显德还特招募来自胶州的一个身高不足三尺的矮人姜太宏，并认其作为干儿子，因其扎了一根辫子，被郭显德的儿女称为“猪弟弟”。姜太宏主要负责招徕吸引观众，引导观众参观，并不时宣讲，颇得民众喜欢。为配合民众参观，在博物院福音堂内每日所讲题目，除了单纯的布道外，还常与博物院所藏物品结合，有时为解剖鸟兽、分化天文、探大西洋之海底、捕北冰洋之鲸鱼，指图为明，看物为

准，或专讲珊瑚、分授鲸鱼，使观众真正受益，听讲之后民众才进入展区欣赏。

考虑到遵守中国旧俗，烟台博物院每年还有专门一日只对妇女开放，不许男人进内，宣讲时有涉及放足内容，妇女也多带儿童前来，1915年有一天当天参观人数达到5275人。当时民众极少接触西洋事物，博物院亦以其新颖的展品而声名远播，有的观者来自内陆偏远的农村，每个人回去后，争相告诉别人关于博物院里一切奇妙的事情，以及他们在那里所受的欢迎，参观者的不断传播，导致到博物院的观者络绎不绝。烟台为开放海港，外来海客在此短暂停留者颇多，参观博物院后，随其行迹博物院得到广为宣传，扩大了其在省外的影响。博物院还装有旋轴计数器，专门统计每日参观人数。

郭显德1920年初在烟台病逝后，其女婿魁格海(James R. E. Craighead)曾于1921年在美国出版英文《郭显德传》，据该书记载，“该院自建院来参观博物观众达300多万人次，每年来院参观者约75000至100000人次”。

讲完了道，众人一哄而散

烟台博物院在当地还从事社会福利事业，救助贫民。时博物院鉴于附近失学儿童及妇女中的文盲过多，曾设立半日学校、平民学校、妇女班，教授妇女儿童识字，学生百余人，成绩颇佳。

该院每月还组织母亲节，呼吁各校学生各请其母亲前来集会，宣讲家庭卫生常识；因当时平民生活贫困，无钱看病，博物院亦成立平民医所，请美国北长老会开办的烟台毓璜顶医院的医生每周六来所服务。除少许挂号费外，其余免费；该院还设立看护学习班，由毓璜顶医院护士每周来教导妇女学员3次，甚得益处；

每年冬至节前后，博物院亦募捐钱款及衣物，对贫民施行赈济。博物院的慈善事业，不仅赢得了民众好感，也增加了入院参观的人数，为布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烟台博物院开办的初衷即是借展览为布道创造机会，故博物院在布置上也是为布道考虑，包括平房27间和楼房10间的四进房屋：第一进为讲道室，凡参观者必先听牧师布道；第二进，陈列出自太平洋的各种珊瑚及矿石；第三进为鸟兽及植物标本；第四进，陈列物理、化学仪器及各种图书，其中，尤以六棱镜最为吸引人。参观结束后，亦有专人与感兴趣的观众讲道。毕竟博物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因此宗教活动安排较多。博物院每日自上午9点至下午4点为讲道时间，每半小时作一次宣讲，听众先听布道然后再准参观，并散发传单、福音圣经册子。当时由于参观人数众多，博物院采取分批向观者讲道，亦有对讲道极感兴趣者。据连警斋记载，“曾有许多商人，来院目的，只在听道，不在参观，故听一班，不去参观，仍留原座，又听一班，不厌其烦，始终不去”。礼拜日上午特请各名人轮流主讲，下午由益文学校热心学员担任儿童宗教班辅导，晚间映射宗教电影，凭券入座，先男宾，后女宾，演的是圣经故事。当时，电影尚算新鲜事物，一时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据统计，电影播放后的一个月，观众达5900余人次。因此受感而信仰基督者，亦有人在，暑期另设有夏令儿童圣经班，专为儿童宗教教育服务。每逢周末，博物院还请各教会热诚信徒，分别轮流到院演讲。亦有烟台圣经学校学生实习讲道，在郭显德带领下向听众布道，时间二三十分钟不等。

烟台博物院作为烟台布道工作中心，各教会和基督徒们可以自由借用它作为聚会之所，开会时，常人满为患。此外，每逢乡村传道妇女训练班，长老会议以及领袖训练班在院举行之时，有些基督徒亦可暂住院中数天。据当时美国长老会在上海的中文机关报《通商报》的文章称：在1927年，“来院听道者男宾34175名，女宾10099名，共44274名，售散福音单张2500余本，片子数万张”。博物院虽然吸引了少数人入教，但多数民众并无虔诚的宗教信仰，其受布道的影响较小，据连警斋记载，“讲完了道，众人一哄而散，有人问今天讲的是什么道，他回答不出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因烟台博物院为美国教会开办，得以继续开放。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烟台博物院为日军接管。1945年烟台首次解放后，这里照常开张，维持旧貌不变。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占领烟台时，此处成为万国救济会办事处。1948年秋，烟台二次解放，烟台博物院为人民政府接管，改为人民文化宫。后来，该馆迁移新址，旧址改为民宅。

烟台博物院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建立的西方博物馆，其开办的展览及社会教育事业，开阔了当时极少接触西方事物的当地民众的视野，传播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加深了民众对西方的认识与理解，进而逐步消除对基督教的误解与偏见，利于山东传教事业的进展。不可否认，教会博物馆的设立也带有吸引民众进而借机传教的功利动机，虽然其每年吸引大批社会各界人士入院参观，为布道提供了绝佳机会，但观者多是怀着对展品好奇心而来，真正对博物院宣讲的福音感兴趣者甚少，其在布道上取得的效果不佳，并未达到其开办的初衷。

山海经

长申地

□ 王绍忠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章丘闻家峪乡长申地村头社长鞠良友、梁坤倡议村民修一处有神农、尧、舜、禹、汤王五位先祖塑像的“五圣祠”，以保佑村内人丁兴旺、四季平安、祛瘟避邪、五谷丰盈。此举得到全庄村民的赞同和支持，不足三日就筹集齐钱粮。从初夏至秋收结束，一座庄重肃穆的庙宇就盖好了。石碑图案、文字设计由当地工匠雕刻，但村内无一读书人，碑文由谁来主笔合适呢？鞠良友祖父曾由亲戚相托，跟随蒲公上过两年私塾，于是他推荐德高望重的蒲松龄执笔撰写。众村民一致赞同。于是，鞠良友便派人驱赶二马轿车去毕家村，把年逾花甲的蒲公接到村中。

驰名中外的清朝文学家蒲松龄，世居淄川蒲家庄。他应宦宦世家毕际友之聘，在王村西铺村设馆施教达三十载，因与章丘毗邻(章丘原归淄博管辖)，章丘的人文地理、山川风貌，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普集的东陵山、明水的百脉泉，数次出现于他的诗文中。

蒲公毕生追求科举，历史记载有六次章丘之行。康熙十年(1670)，他应江苏宝应县令孙慧文之邀前作幕僚，途经章丘青石关，留下五言诗一首：“身在瓮盎中，仰望乌飞渡……”二次赴章丘，是他于八年后去省城应试，归途遭遇暴雨，不得不宿留明水。他在《明水遇雨》诗中吟道：“急雨来时村舍黑，垂柳深处酒旗青……”又八年后，章丘县令邀淄川县令张喙来观赏百脉泉，张县令约蒲公前来作陪。蒲松龄此行兴致极高，一气和了张县令的《过明水》诗八首：“黄鸟时鸣杨柳柳，清流长绕稻荷乡……”一晃又是十年，57岁的蒲松龄与张历友结伴于重阳节游览了章丘女郎山，写了两首诗，其中之一曰：“当年曾此葬双环，垂柳深处酒旗青……”又八年后，章丘县令邀淄川县令张喙来观赏百脉泉，张县令约蒲公前来作陪。蒲松龄此行兴致极高，一气和了张县令的《过明水》诗八首：“黄鸟时鸣杨柳柳，清流长绕稻荷乡……”

蒲松龄这次来长申地是他第六次来章丘。进村当日下午，他即由鞠良友、梁坤二位陪同祭拜了“五圣祠”，次日便同当地高寿的长者开怀畅谈，得知此庄明清建村，不足百户，四面则满六亩，因土地过于狭长，竟达三里之遥，故以此命名。庄小人稀，自古无祠无庙。因今年收成喜人，村民遂产生修祠之念。

蒲公由此获知山村民风淳朴，老幼无赌博、酗酒之染，便于当夜精心构思，提笔挥毫，一气呵成《创修五圣祠碑记》：“长申地，章丘东南之山村也……村中数十家，直率朴实，有古道……村以小，故独无，居人忧憾之。庶几春秋祈报，可托如在之诚，浆水呼名，亦可招魂之地。词虽近俚，而固无害于义，众人之诚朴，亦从可知也。初冬落成，使余记之。余亦从俗，而为之记。康熙三十八年岁次乙卯阳月中浣淄川蒲松龄沐手拜撰。”

1962年，在常年无人问津、破败不堪的五圣祠旧址的残壁中，一中学生趁暑期到山野割草甸牛，在石碑落款中无意间发现了蒲松龄三字，知晓这是前辈遗留文物，于是报告了村中大队部，遂后又逐级汇报于公社，经省市文物专家鉴定，这是蒲松龄生前留在章丘唯一碑记，极具收藏价值。后被县博物馆珍存，免遭文革被毁之灾。

碑文系青石雕刻，体高二米，碑顶呈圆形，宽0.72米，碑文正楷书写，计207字，字迹工整清晰，完好如初。这是蒲松龄除其《聊斋志异》外的又一宝贵文化遗产，也为章丘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 海岱一方

王家庄子战斗：国共合作抗日的范例

□ 李祥瑞

1939年7月，侵华日军在临沂莒南大店设立据点，经常派兵四处“扫荡”，烧杀劫掠，奸淫、无恶不作，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在莒南县就发生了多次抗日斗争，王家庄子战斗是其中有名的一次。

此战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莒南县大队配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爱国将领常恩多师长率领的111师333旅(旅长王肇治，后任万毅)666团(团长关靖寰)对侵略军进行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两军配合共击毙日军二百余人，五十七军将士阵亡4人，县大队50人参战无一伤亡，真是神奇。这次大捷，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信心和斗志。

村民王凤田指路

1939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一群二百余人的扫荡日军在日照石臼所登陆，顺岚皋公路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地前进，步兵、骑兵、炮兵一路耀武扬威，尘土飞扬，他们就是日军第六混成旅督早支队、中队长申中信，准备到达县城的十字路再奔回他们的据点——大店。

驻防朱冲、文疃、甲子山区的国民党五十七军111师得知后，决定对日军伏击，伏击地点选在大峪崖村前大崖头下的河川，由王肇治和关靖寰指挥。这里从西南方和西北方有两条小河到此处交汇流入龙王河，当地称三岔河口，南面是陡崖高岭，北面也是高岭长坡，西面是长一华里的陡坡，这是日军必走之路，此处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为争取时间，师部先派一部骑兵在坪上以东尾追、分三队轮回牵制日军，以此拖住日军，使之行动缓慢。约下午四时，日军进入设伏河时，666团还未到达，尚距伏击地点三华里，只好在北

高庄前河和杜家岭村村南暂时隐蔽起来。当日军聚集到大崖头下开始爬坡时，我军骑兵全部追上日军展开激烈交火，日军边战边爬坡，艰难地到达大路北面高地时，已是傍晚时分。日军抓住坡木村的一名老百姓做向导，向导指着通向西北方向的一条路说：“这条路是通往大店的一条近路，平时推盐的、经商的、赶骆驼的都走这条路，而且前面三华里有个二百多户人家的村，叫王家庄子，西面就是赤眉山，向西到十字路只有七华里，村内有坊子(饭店)吃住都方便，安全。”日军听此决定进驻王家庄子。

日军进村天已黑，他们观察后地形后，做好防备，见村内有两处坊子，内有酒婆，日军打开酒婆，先让抓来的村民喝了，见无毒后，即狂饮起来。

再说村民王凤田被鬼子抓住给鬼子铡草喂马，在村外碰到111师侦查员，便向侦查员讲了村内的情况。侦查员大胆换上便衣，先把守门的哨兵干掉，进村察看地形和日军火力点。侦查员见几个鬼子喝醉了倒在大街上，还有几捆枪竖在一边，就顺手将两捆枪掖到村北的马汪(湖)里。

关团长设下埋伏

关团长听了侦查员的汇报，命令一个营在北

东边约300米处的岭坡上隐蔽，担任主攻任务。另一个营则埋伏在村南两个干沟内，还有一队伏兵蹲守在村西的拉马沟中，其余兵力由关团长带领上了王家庄子西南三华里处的赤眉山顶北坡，把炮兵设在山顶北侧玉皇庙部位。

第二天一大早，隶属八路军的莒南县大队即十字路游击队大队长张子亮带领50名战士也来参战，由关团长统一指挥。24日凌晨三时，战斗打响，先是我军炮轰敌阵地，接着向村内发炮，村北面我主攻营兵分两路开始攻击。日军正在醉梦中，被突如其来地枪声惊醒，仓皇应战，有的找不到枪了，乱作一团。我军炮火非常猛烈，天亮时日军全部被压到村内。在火力掩护下，我军突击队数十人手持大刀，沿操马湖冲上前去把日军战马打死四匹，其余五十四战马全部夺获。

村出口大门东北角有一个董家土炮楼，开始被日军占据。我军从村东头搭人梯进入村内，开始展开巷战，并抢占了董家炮楼。巷战中，我军士气十分高涨，手榴弹、枪声响起一片，这天正是东风，部分战士又把村东南角部分民房的草屋点燃，风助火势，形成火海一片，浓烟滚滚，迫使日军从村内向西逃窜。

激战到午后二时，日军支撑不住，开始向西北大店方向突围。第一队50名日军沿村前河北岸的小路往西去，正走进我军大队伏击圈。在相距



抗战时八路军制作的反战宣传画

150米时，县大队长张子亮一声令下，随着一阵猛烈枪声，日军即倒下十几个。其余日军抢占北面50米处的柏树林墓地，当日军进入柏树林后，我赤眉山顶上炮兵居高临下，当场炸死日军二十多名。剩余日军调头狼狽往村内逃窜。这时，村内已被我军控制，日军全部被赶到了村西的打谷场

上。日军见突围不成，便疯狂用野炮朝东西各打了一炮，向其上级求援。但炮声引来了北面庙子岭上我军轻重机枪一阵猛烈扫射，日军被打倒五十多名死在打谷场上，剩余百余人被我军火力压制村前河滩上。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便从东西干沟之间往南逃窜，目睹的村民后来说：“就像羊群一样。”

在岭半坡，东西干沟的我伏兵齐起，与日军展开激烈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除十名日军向领南逃窜外，其余被全歼。

县大队无一伤亡

南逃的日军在龙掌村北岭、磨石岭等村被村民打死，有一日军情急之下把半身藏在拉马沟石缝中被温泉水民兵将凤起发现，上去抱住向外拉，日军用最后一颗子弹把将凤起打死。随后到来的村民怒不可遏，用石块将他打死。有一日军逃至十字路西边的石桥村要水喝，被一铁匠打死。还有三个日军逃至筵宾西边的邢家水么村，被民兵打死一人，另一日军因伤势重，用仅有的一粒子弹自尽。只有一人逃往大店。

赤眉山上响起了胜利的军号声，我军25日前全部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胜利结束，我五十七军将士阵亡4名，县大队无一伤亡。我军共缴获日军三八野炮一门，九二式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其它枪支大宗，战马50匹，两瓦无线电一部。

1940年2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文章称：“此次战役为八路军与友军配合作战之范例。”莒南县大队受到中共鲁南特委军事部通令表扬。